

# 中国经济学走向何处：复杂经济学视域下 新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学的重构

安同良，魏婕

**[摘要]** 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革命深刻改变了人类的一切经济社会活动，同时正在引发以复杂经济学为主导的新一轮经济学范式的崛起。近年来中国新经济蓬勃发展，正引领着全球科技变革与产业发展，更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重构。在研究新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演变的基础上，本文借鉴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硬核，运用复杂经济学框架及吸收各类经济学说的有用成分，试图构建具有“硬核—保护带—启发性思路”完整架构、面向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经济学。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内嵌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与理论变迁的动态演化过程，是以信息网络空间与复杂经济视域等视角为底层逻辑、以人民为中心的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构筑与繁荣为本质的经济学范式。本文为“中国经济学走向何处”及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探索了可能的路径。

**[关键词]** 中国经济学； 新经济； 复杂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 F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480X(2023)12-0005-19  
DOI:10.19581/j.cnki.ciejournal.2023.12.001

## 一、引言

以万物互联、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数字与生物技术革命为核心的新经济革命，正深刻改变、重塑着人类的生产、投资、流通、消费与生存空间等一切经济社会活动(Tapscott, 1995; 尼葛洛庞帝, 1996)。在此过程中，全球的技术进步呈现新态势，表现出复杂性融合与高速增长，不再以线性方式发展。新经济时代，国家间的比较优势从传统的资本、工业技术、劳动力等转向数据与网络市场、数字与生物技术、人工智能与创新力等，这大大降低了新兴经济体参与新一轮全球经济竞争的门槛，为具有数字经济发展潜力的新兴经济体“换道超车”提供了崭新的历史机遇。

**[收稿日期]** 2023-09-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式创新的综合优势、模式演进及体制机制的经济学研究”(批准号 22AZD11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知识—地理双模网络视角下中国知识复杂度的测度及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批准号 7210040759)。

**[作者简介]** 安同良，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魏婕，南京大学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聘副教授，经济学博士。通讯作者：魏婕，电子邮箱：winniewei@nju.edu.cn。感谢南京大学任保平教授、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如何把握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技术跨越以及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重大机遇,成为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极为重要的抉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需要新的大国行动指南、基本方略。面对新经济冲击形成的新实践、新问题,同时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中国亟须经济学理论的嬗变与创新——通过构建自主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来应对新技术加速革新、全球经济格局重塑、各类不确定冲击等大变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言: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

经济学理论范式一直都是时代变迁的产物。随着人类社会技术条件、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迁,需要构筑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学理论范式或理论体系。众所周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导范式的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当人类已经进入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更高级经济形态的新经济时代,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一些核心概念与逻辑范式不得不被重写、修正。解释现象和预测未来是理论创新的归宿,面对新经济时代,需要新理论来准确解释新经济现象和更有效指导新经济发展的实践。同时基于中国在新时代依靠新经济发展来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实践需要,需要有超越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框架范式,以及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现象而提炼出来的原创性理论。所以,用新理论范式、新理论逻辑来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中国“四个自信”的题中之义,更是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sup>①</sup>的根本要求。

本文从文献演进的角度梳理了复杂经济学范式的兴起,在厘清新经济的复杂经济学发展特征基础上,刻画了新经济在中国发展的典型事实。进一步在研究新中国经济学范式演变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与新时代中国新经济的迅猛发展,运用复杂经济学框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硬核,试图重构基于新经济的“科学研究纲领”——中国经济学。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质上并不是孤立的假说,而是一个进步的科学研究纲领,它有其硬核(或内核)、保护带与解题的启发性方法论(拉卡托斯,1986),其范式的先进性不仅体现在能解释中国既往的经济奇迹,而且更能够预测新时代、新经济等中国经济发展诸多新颖的事实(安同良,2020),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启迪。

## 二、文献演进:复杂经济学的兴起

20世纪90年代,美国率先提出“新经济”这一概念(Shepard,1997)。阿特金森和科尔特(2000)总结为:新经济是一种基于知识和思想的经济,可以说新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根本性变化。新经济不同于知识经济,新经济是依托于知识经济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范式。本文认为,“新经济”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由万物互联、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一系列新技术革命引致的新经济范式。对于新经济,之前诸多研究将其定义为“信息经济”和“网络经济”(Shapiro and Varian,1999)。自从1995年唐·塔普斯科特(Tapscott,1995)最早明确提出“数字经济”一词开始,数字经济概念逐渐被各国使用,但普遍共识认为数字经济是新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具

<sup>①</sup> 参见《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第01版。

体形态。所以,实质上这些概念都是从不同角度刻画新经济(许宪春等,2020)。本文认为,用“新经济”来概括当下这一大大迥异于之前的经济范式变革,应该更符合经济的变迁历史,“新经济”更能凝练成一个更大范畴的共识。近几年中国才开始普遍使用数字经济这一概念,数字经济与新经济有一脉相承的逻辑。

人类技术变革的每一次大跨越都为生产方式演化创造了新的成长空间,新经济时代新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必然呼唤新的经济学理论的创生。正如米塞斯(2015)所言:经济学不是按逻辑和数学程序展开的,它不是一个脱离现实的纯粹演绎推理的完整体系。<sup>①</sup>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万物互联等数字技术为通用目的的技术标志的新经济时代来临,这一重大时代变革无疑会对建立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提出巨大的挑战(Arthur, 1999a; 张翼成等, 2018)。具体而言:①新经济迅猛发展和颠覆式创新首先使经济学研究对象脱胎换骨。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重点关注均质经济主体的行为与互动,以及经济体系的均衡运行。而新经济的出现及其发展对经济社会的资源配置模式、市场交易关系、企业治理结构、经济增长路径等均产生了颠覆性影响。②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冲击着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微观个体的网络化崛起、机器学习代替经济决策以及大数据基础上的关联预测,正在改写传统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以及统计推断方法;与此同时,大数据全面性和实时动态性会将一些经济理论证伪。

由此可见,依托工业文明搭建的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很难与以“信息文明”为标志的新时代相契合。虽然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学者对新技术革命中的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重组等与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和效率提升、中观层面的产业演化、微观层面的企业创新行为和组织管理的关系均有讨论,但其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硬核并未改变。物理学均衡思维的隐喻、同质主体以及线性的结构是其独特的“硬核”,该“硬核”早在方法论层面被诟病。Helbing and Balmelli(2010)强调:传统西方主流经济模型为了逻辑自洽而遗漏了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是从未考虑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与持续演化的特征。Rosser(2021)认为复杂经济学时代正在取代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时代。所以,需要一个崭新的、颠覆性的与新经济相适应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复杂经济学正是人类信息文明的结晶(唐任伍等,2020)。

阿瑟(2018)曾提到:在经济学的历史长河中,有关复杂性与非均衡的经济学问题,熊彼特、凡勃伦、哈耶克和沙克尔等经济学家都曾研究过。事实上,在近现代经济学思想发展史上有两次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都在范式与方法论层面呈现出复杂性的框架:一是发端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革命。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发现了非均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支配性特征。从概念、范畴体系和分析方法看,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阐释的生产方式,其方法恰恰是一种复杂性方法(邬焜,2006)。二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杨小凯等人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重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均衡模型,其讨论的核心问题以及采取的建模方法可以说是复杂性思维的直觉运用与实践方式。虽说复杂性思维及观点并非经济学的新问题,但真正意义上的“复杂经济学”发源于复杂性科学。复杂性科学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开始孕育,赫伯特·西蒙(Simon, 1962)是第一个分析复杂性架构的人。1984年,由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一批从事物理、经济、生物、计算机科学的著名研究人员集合在一起创立了圣塔菲研究所,试图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方法找出复杂系统的一般规律。

复杂性是客观世界固有的本性。但至今,学者们仍然未能给出一致的复杂性定义(米歇尔,

<sup>①</sup> 具体可参见冯·米塞斯在《人的行为》一书中的论述。

2011),霍根(1997)曾总结出复杂性的45种定义。阿瑟(2018)指出,复杂性核心在于复杂系统,所以复杂性概念的核心要义在于复杂系统的类型以及具体特征。西蒙(1987)认为,复杂性采取层次结构形态,复杂性是进化的结果、是系统的动态性质,应从复杂性的描述即信息角度区分简单与复杂。克拉默(2000)则利用系统定义了复杂性,复杂性即为系统表明自身方式数目的对数,或者系统可能状态数目的对数: $K = \log N$ ,其中, $K$ 是复杂性, $N$ 是不同的可能状态数。

圣塔菲研究所基于复杂性科学,较早刻画了复杂适应系统的特征,认为其是具有涌现和自我组织行为的系统。该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Arthur, 1989, 1999a)则在报酬递增与技术进化的基础上提出“复杂经济学”的概念,对复杂经济学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圣塔菲研究所的众多学者对经济体系的复杂性与复杂经济学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与建构。截至目前,复杂经济学正在建构中,尚缺乏统一且精确的定义。本文认为:复杂经济学是以有限理性的异质性行为主体为基础,将经济体系作为复杂适应系统(本质是根本复杂系统,即系统不再是可编程的,其特征为不可确定性),研究经济结构变化、经济组织涌现、创新与知识变革、国家财富创造等非均衡过程的经济学范式。作为关于研究正在涌现事物的经济学,其核心主题是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的运行机理。复杂经济学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思想逻辑、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层面均有本质区别,复杂经济学具有全新的经济学视角与处理经济问题的新方法。复杂经济学放宽了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诸多假设,其经济学范式是对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标准假设的超越,其主体假设、分析逻辑和理论框架更接近现实世界。总之,复杂经济学是在反思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弊端基础上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是其子集,它是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一条新路径上更高层次的新发展,所以说复杂经济学是更具普遍性、科学性的经济学范式(Arthur, 2021)。在借鉴巴拉巴西(2013)、拜恩霍克(2019)、Arthur(2021)、Rosser(2021)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总结了复杂经济学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区别(见表1)。

表1 复杂经济学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区别

	复杂经济学	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
思维与理性	生物学的进化思维:基于进化计算的世界观、非线性思维;理性没被定义	物理学思维:基于均衡方程的世界观、线性思维;完美无限理性
主体与行为	异质性、多样化行为人,使用归纳性的经验法则做决策,能够学习与适应;面对定义不明确的问题	代表性或关于类型分布的行为人,使用复杂的、演绎的计算来做决策,较少有学习和适应;面对定义良好的问题
网络与互动	清晰地模拟个体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网络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假设行为主体只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互动和行为优化
涌现与反馈	微观与宏观经济没有区别,宏观结果是微观层面行为与互动的结果;收益递增和递减均会存在	微观、宏观经济并未完全融合,宏观逻辑是微观加总的结果;收益递减
系统与进化	开放的、系统可被利用;变异、选择和放大的进化过程使得系统能够创新;进化过程引发了秩序和复杂程度的变化	新的行为不被接受;动态逻辑中没有时时的变化、选择;秩序和复杂程度不会时时发生变化
时空与连接	时间与空间融合在一起,物理空间与信息网络空间融合在一起,生产者与消费者合一	时间与空间分离,物理空间与信息网络空间分离,生产者与消费者分离
时间与方法	历史和路径是重要的;基于Agent的建模、计算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复杂网络分析等	均衡;基于代表性个体的边际分析、均衡分析、效用最大化分析等
收益与分配	幂律分布;富者愈富、赢者通吃的市场变得更普遍	钟形分布;按传统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

当人类进入新经济引致形成的更复杂的新时代,适应这种深刻、全面的大变革需要新理念与新方法,复杂经济学审视新经济的冲击正当其时(米歇尔,2011;Elsner et al.,2015)。可见,以新经济为核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引发以复杂经济学为主导的新一轮经济学范式的崛起。

复杂性科学研究在中国起步比较晚,较早由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西蒙(1987)介绍到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钱学森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引领了中国学术界研究复杂性科学的序幕。在经济管理领域,汪应洛和黄长征(1997)、刘洪(2001)等研究了经济系统的复杂性、混沌管理以及混沌模型的算法与控制等理论问题。后续陈平(2004)、贾根良(2006)强调复杂性科学和演化经济学的共同实质,其历史的、制度的、比较的特征是理解经济现象以及解释中国问题的重要范式。文建东(2006)、苗东升(2010)肯定经济学研究要打破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主流的思路和方法,需要复杂经济学的逻辑与范式。近几年,随着布莱恩·阿瑟《技术的本质》(2014)、《复杂经济学:经济思想的新框架》(2018)等中译本的出版,复杂经济学的思想在中国学术界再次引起高度关注。安同良等(2023a,2023b)应用复杂经济学思维及复杂网络方法,构造了测度“卡脖子”技术的通用算法,并揭示了万物互联下企业创新新模式的底层逻辑。复杂性科学及复杂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为以复杂经济学作为核心架构来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复杂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阿瑟(2018)强调,“与新古典主义理论中的世界相比,复杂经济学的世界更接近于政治经济学中的世界,那是一个有机的,进化的,充斥着历史偶然性的世界”。所以构建中国经济学需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底层逻辑,以中国快速发展的新经济为实践逻辑,而复杂经济学恰恰是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发展。

### 三、新经济发展引致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演变

#### 1. 复杂经济视域的新经济发展特征

以“云+网+端”万物互联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与通信技术,可以被视为通用目的技术,且是最通用的通用目的技术(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2016)。与通用目的技术定义对照,新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具有普遍性与先进性。这种通用目的技术的采用几乎会影响所有经济行为主体,从而重构所有经济活动;另外,新的通信技术是沿着数据新生产要素所决定的技术路径,连续引入新互补性技术所形成的新技术系统。纵观人类历史一次又一次技术革命,每一次新的通用目的技术革新都会带来新技术系统复杂性层级的提升。与之前技术革命相比,新技术系统形成的通用目的技术革命的突出特点是更高层次的复杂性:一方面,其自身的发展、实施和演进是复杂性、系统化的过程,其未来演进具有不可确定性;另一方面,其演进的过程会深深地扎根于相互影响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系统结构之中,衍生出一个复杂系统(阿瑟,2014)。为此,新经济是经济结构非均衡变迁,它包含着技术进化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对经济结构与制度新安排、新调整的复杂相变。

(1) 新经济是分子集合式的复杂网络,“小世界网络”形态与自增强的网络规模效应并存。新经济最一般的特征即万物互联,在互联网的连接下,整个社会的网络连接出现泛化。物联网成为新经济最为核心的基础设施,推动智能基础设施的革命。可以说,新经济是网络化的经济,主要依靠网络将经济主体像分子一样集合成群,工业时代的企业形态正在让位于新经济背景下分子化的组织和机构(Tapscott,1995)。人类分子(知识性员工)是构成企业的基本要素,大规模的生产会变成分子化生产,在新经济条件下,分子活动会延伸到整个经济,整个经济社会都呈现从大众化向分子化

的演变。<sup>①</sup>新经济形成分子间的互动系统,组成了高度复杂的网络集合体。该网络集合体为无标度网络,枢纽节点与幂律支配着该复杂网络行为(巴拉巴西,2013;安同良等,2023b)。在这一网络集合体中,一方面,世界呈现出“小”的特征,新经济形成的网络化特征使得分子之间在网络中平均间隔变小,同时聚合系数变高,即典型的“超小世界网络”形态;另一方面,世界呈现出“大”的特征,内含无限量大数据的新经济,其网络处理能力呈现指数级增长,从而创造出强劲的网络规模经济。信息革命催生出了大量的全球性网络化企业,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撬动了自增强的经济规模。同时,由于“大”的特征进一步使得复杂程度呈现数量级的提升,网络内的部分变化会对其他部分产生涟漪效应,这种相依性会造成“复杂性灾难”<sup>②</sup>。

(2)新经济是存在交叉模糊分层交互作用的系统,分散组织层级以崭新且复杂的形式持续涌现。新经济一方面会与传统经济一样由庞大的网络层次组成:个体(分子)在企业中互动,企业市场中互动,而市场在全球经济中互动,经济呈现出复杂的网络层级形态;另一方面,新经济会突破传统层级之间的互动关系,层级形态以崭新形式涌现。协同共享是第一个“生根”的新经济模式。在协同共享中,参与者的消费者和生产者身份界限在模糊。产消者通过互联网高效快速地匹配分散的供需双方,从而把闲置的生产能力与需求进行精准匹配,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于是,协同共享新模式致使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都有可能进入这种“零边际生产成本”模式(里夫金,2014)。传统微观主体界限变得模糊,同时网络技术正在消除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中间环节,去中间化成为趋势。在企业层面,企业虽然仍保持独立的身份,但企业之间的多边联系和合作会在平台组织与产业互联网的推动下呈现高效性与持续性。此外,企业存在形式在新经济时代会呈现多元化,企业与市场之间动态边界因成本效应而呈现多样化。在全球层面,网络可以实现跨时空交流,知识的无国界化会让传统全球层级裂变。在由新经济形成的全球一体化系统中,时序结构或层次结构的线性逻辑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分散交互、多维链环形态的“自组织”特征。所以,新经济形成模糊的层次性以及子系统内部的紧密特征,是突出的复杂系统共性。

(3)新经济是创新涌现、非均衡的经济范式,创新力社会来临强调经济主体适应性学习。新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工<sup>③</sup>将取代传统产业和产品专业化分工模式。通过知识分工、知识协作、知识互惠组成的新技术、新要素、新产品、新模式、新产业的创新生态圈,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力与引擎。同时,新经济最突出的特征在于人工智能无处不在。当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不断深化,使得新经济时代技术与产品生命周期日益缩短成为趋势,整个社会形态进入创新力社会。极为重要的是,人类心智成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熊彼特曾认为:“经济体系中由生产方式的新组合产生的力量,能够破坏任何可能达到的均衡”,所以,新经济的自然状态是非均衡性。一方面,这种永恒技术变革的力量不仅会一次次地破坏均衡,而且“技术变化会内生地、不断地创造出更进一步的变化,从而使经济处于永远的变化之中”(Arthur, 1999b);另一方面,这种技术变革、模式革新形成的不确定性在经济体系中深度渗透,经济主体在更为不确定的环境下且拥有不充分信息情形下,基于完全理性的“最优”行动无法存在,非均衡内生于复杂系统中。虽然新经济的高效数据采集和发达算力

① 参见 Tapscott(1995)第62页有关新经济12大主题中的“分子化”。

② 复杂网络中因其“大”会存在级联故障,因为网络效应表明一个节点行为会影响整个系统的演化,特别是导致整个网络的瘫痪。所以,由复杂网络刻画的复杂系统中,常存在从节点故障演变成体系动摇的“复杂性灾难”。

③ 早在1936年哈耶克就提到“知识分工”,之后他不断呼吁和强化知识分工的重要意义。

会使得获取诸多信息的成本趋近于零,但这与海量、复杂的信息以及时时革新的整个体系相比仍是“相形见绌”,有限理性在新经济时代更为明显。所以,新经济带来的时时变化迫使行为主体必须“摸索前行”,经济行为主体在动态进化中如何适应、在网络化中如何学习,正是由于经济非均衡内嵌所致。

(4)新经济是连续适应、不断涌现的动态进化过程,人类命运深度依存呼唤着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新经济是由分散的经济主体及其环境在新信息技术聚合下形成的有机体。这一有机体在新产业聚合和网络互联型企业的主导下呈现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的自我演化与发展过程。在此演化过程中,由于互联网效力的发挥,即人人参与其中,总体表现优于所有个体表现之和,系统的整体特征内生于个体及环境相互作用中的“涌现”现象。由于互联网将每一个个体捆绑其中,全球化的网络空间正在构筑着更加扁平化的“地球村”,人类成为命运共同体。里夫金(2014)强调,“在协同共享的时代,一切生物都在错综复杂的生物圈生态系统共生和协同,且整个系统正常运转决定着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基于协同共生生物圈形成的“共同体”,在新经济技术冲击下维系着一种紧密的相互依存与相互交织关系。所以人类的共同新信念建立在生物圈意识之上,颠覆性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与形态正在被新经济“创生”。

在理解新经济时,若还采取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框架,将会“捉襟见肘”。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认知呈现一种简单的线性化思维。但“世界是复杂的,是有结构有历史的,发展是多样演化的”(Arthur, 1997),更为重要的是新经济呈现出复杂经济典型特征。所以,抛弃线性思维、完备理性、均衡思路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以复杂经济学视域,运用非线性思维、有限理性、非均衡思路等方法,才能更好地刻画新经济涌现的诸多新事物、新形态与新特征。

## 2. 新经济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呼唤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重构

中国正在敏锐抓住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发展新经济及数字经济。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到了“新经济”对于世界的意义,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催生智能制造、互联网+、分享经济等新科技、新经济、新业态,蕴含着巨大商机”。2016年“新经济”一词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国家层面对中国“新经济”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与安排。2018年《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印发,数字经济发展被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2021年《“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制定,为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一文,系统强调了发展数字经济的战略意义和基本构想。2023年《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印发,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

在经济思想史上,每一次新通用目的技术的进步都会引致经济形态的转变,进而引发经济学理论创新与研究范式转变。恩格斯曾说,“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sup>①</sup>中国新一代信息通用目的技术、新经济的引领发展,对刻画其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一方面,大国特征的中国新经济体量超大,引致新经济系统的高度复杂性,亟须中国经济学理论认知新经济,并提供理论指导。中国新经济指数(NEI)显示,从2017年开始至今中国新经济投入占全部经济投入的比重约为30%。这里根据2019年公布的中国投入产出延长表,对149个细分行

<sup>①</sup>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2页。

业进行再分类。<sup>①</sup>通过计算对比2017年和2012年的数据发现:新经济不论是产值,还是产业的影响力系数与感应力系数,均发生了大幅度的提升和增强。FT-Omdia Index显示,中国持续保持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地位,这均印证了中国新经济的迅速崛起不但成为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引擎”,而且正在成为全球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引领者。<sup>②</sup>中国的大国特征、超大规模性,决定了中国新经济体量超大、市场规模超大以及风险挑战巨大、规制难度陡增,这些规模演变从小到大的增长通常伴随着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这使得相比其他国家,中国新经济发展经济聚合特征决定了其多变性,新的发展条件、新的技术冲击以及与之匹配的新制度环境决定了这一系统演化的复杂性与过程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使得系统涌现性和路径依赖的机制普遍存在。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根本不可能把握中国新经济发展的规律,亟须变革的、先导性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来指导、助推、规制新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新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以及面对机遇与挑战的多维性,需要特色经济学理论帮助中国在引领世界发展中贡献中国方案。中国具有人口最广泛的数字用户、领先的平台企业、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引导新经济发展的制度优势。新经济下中国经济系统存在多个维度的微观经济行为主体以及多层次的环境和组织架构,但各区域的禀赋资源、文化传承和社会治理之间差异较大,这种整体大于其组成部分简单线性总和的复杂系统多层次性是中国新经济的根本特征。该系统另一重要特点在于,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外部条件提高适应和进化的能力。对于中国来说,新技术与传统制造技术相结合,会创造出许多新产品与新服务,使技术机会明显增多,这就会增加以中国为首的技术后发国在新技术层面“弯道超车”的机会;但新技术革命也带来了全球经济更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发达国家凭借在传统制造业方面的技术积累与高技术人才的储备,其在拥抱新技术革命过程中优势会比较明显,所以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塑与世界各大经济体力量博弈成为当下历史浪潮的主趋势。从复杂系统进化和适应的逻辑看,中国如何利用制度优越性结合市场空间的广阔性应对技术先进国家的遏制,以新经济的迅猛发展来助力全面现代化建设,需要中国经济学理论贡献中国方案。

### 3. 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演进

随着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在中国大地上认识与发展新经济,需要创立具有高度原创性的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理论基础、内在结构、实践功能等方面同现有西方主流经济学有本质不同,其既要反映新经济发展的一般经济规律,又要反映新经济在中国的特殊性,同时更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现象、指导中国的新经济。中国自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植根于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变迁。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见图1):

① 本文的“新经济”包含新经济制造业和新经济服务业。其中,“新经济制造业”所涉及行业和代码为医药制品(27050)、其他专用设备(35076)、其他交通运输设备(37081)、计算机(39088)、通信设备(39089)、广播电视设备和雷达及配套设备(39090)、视听设备(39091)、电子元器件(39092)、其他电子设备(39093)、仪器仪表(40094);“新经济服务业”所涉及行业和代码为电信(63121)、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63122)、互联网和相关服务(64123)、软件服务(65124)、信息技术服务(65125)、研究和试验发展(73132)、专业技术服务(74133)、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75134)、娱乐(90147)。

② Omdia与《金融时报》携手发布了FT-Omdia数字经济指数,该指数衡量领先数字经济体的规模与增长情况,并对这些经济体进行排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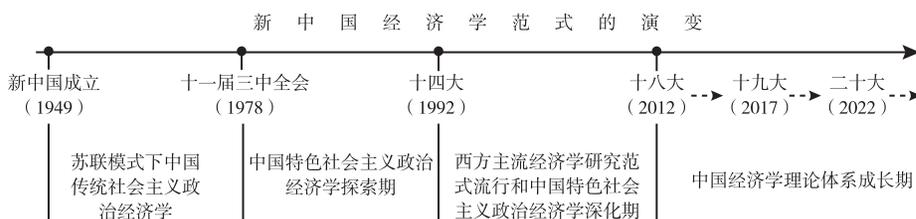


图1 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演变过程

(1)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1978年之前):苏联模式下的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主导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以前,模仿苏联建立起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与之相伴的中国经济学主流范式,是1952年斯大林主持下写成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构建的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随着以苏联为样本的高度集权计划经济模式弊端的凸显,中国经济学界逐渐认识到“苏联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局限,开始尝试探讨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不同所有制及经济成分的关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分配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准备与理论储备。

(2)1978年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四大(1978—199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推动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大量涌现。该阶段中国经济学范式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体框架,开始形成并不断发展,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并创造性地探索了产权规则基本明确、价格协调微观决策、按要素分配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融合的理论框架。

(3)党的十四大到十八大(1992—2012年):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流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化期。党的十四大之后,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推进,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强调市场机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开始成为流行范式。该范式让人们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这一阶段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与调控方式的创新、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有序发展、国有企业改革与微观经济基础重塑等方面的探索实践,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步入深化期。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以解决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导向,形成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积极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有用成分、兼容并蓄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13年之后):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成长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sup>①</sup>同时面对全球新经济蓬勃发展以及自身在国际分工中角色转变的大变局,党的十九大提出“创新”作为首位的“新发展理念”、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生产七要素”(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首次提出)的表述、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来构建国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

<sup>①</sup> 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北京:学习出版社,2023年,第9页。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均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审时度势、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创新性论述,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二十一世纪世界的最新理论成果。这些理论创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推向成熟。

在新时代,中国正面临由“富”到“强”的历史性转变、从全面建设小康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转变,同时新经济革命正冲击着中国既有的经济理论体系及框架。中国经济学已经进入构建自主理论体系的阶段。在这划时代的“双重变化”大局下,立足经济建设的实践重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提炼由“富”到“强”历史经验与模式特征的经济理论,提出面对新经济体现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经济理论体系与逻辑框架,是建构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这一宏伟工程的新方位和新使命,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成长期。

#### 四、复杂经济学视域下新经济发展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 1. 复杂经济学视域下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硬核”与“保护带”

著名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1986)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弥补了波普尔和库恩未能解决的理论缺陷。他认为,“典型的描述重大科学成就的单位不是孤立的假说,而是一个研究纲领”,拥有完整的体系,即一个受到顽强保护的独特“硬核”,以及能够灵活适应的“保护带”,进而产生一种有力的解题手段来消化反常。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作为一个应对新经济冲击、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理论学说,有着自己完整的“科学研究纲领”结构体系(见图2)。硬核是研究纲领最基本的原理与根本性的主张,构成一个理论学说的基石,决定该学说的本质与精髓。硬核不可反驳、不可修改,以此来保证理论的稳定性。新时代发展新经济构建中国经济学,基本硬核必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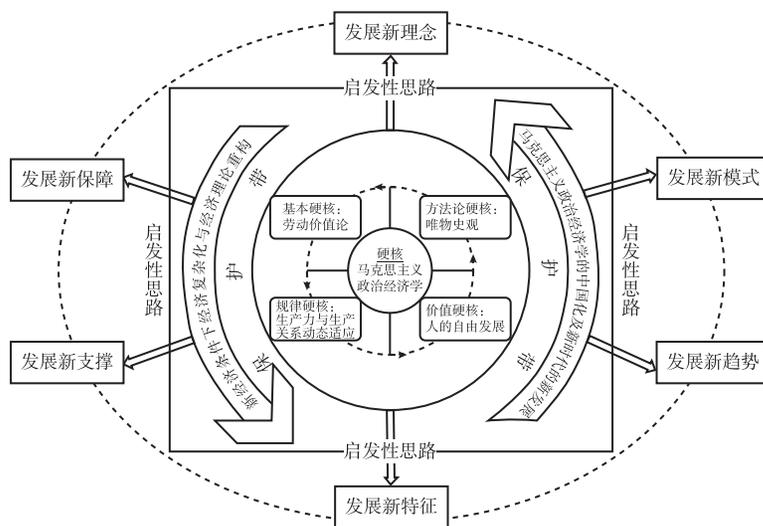


图2 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体系及其范式框架

从理论层面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的唯物史观、创立的劳动价值论、阐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动态适应以及倡导人的自由发展,分别构成了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论硬核”“基本

硬核”“规律硬核”和“价值硬核”。在新经济时代,蕴含隐性知识的创造性劳动出现以及隐性知识的可迁移性,拓展了新经济时代价值创造问题,最为核心的是劳动形式和劳动关系在新经济时代的改变会发展劳动价值理论。新经济时代的最大特征在于,新一代信息通用目的技术的出现和应用生出了新经济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新经济生产力的变革也带来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广义生产关系颠覆性改变,新经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动态适应在新时代表现出新特征。这些在以资源配置与利用为核心议题的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下难以得到体系化的回答。从实践层面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理论。不论什么时代、不论面对什么新情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会居于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地位。这是中国经济学不同时期探索后形成的基本共识(程霖等,2020)。可见,从理论到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硬核”。

在理论体系内部结构中,围绕硬核有明确的保护带,其功能是保护硬核的完整性与不可反驳,反映了理论的适应性与韧性。硬核虽不可打破,但保护带“常新”,对保护带的补充与修正恰是理论丰富、完善与发展的过程。所以,保护带具有开放性、动态性与包容性。基于此,发展新经济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保护带”有两条线路: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及其在新时代的新发展;二是新经济条件下经济复杂化与经济理论的重构。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及其在新时代的新发展。发展新经济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骨架,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与中国新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根据新时代要求进行新发展(洪银兴,202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作出了系统性的原创性贡献。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及其在新时代的新发展这一保护带创生出独特的理论与实践建构。

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根本立场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与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坚持站在全人类的视角审视共同发展,形成同一个地球、同一个世界需要人类共同维护、建设与治理的全球价值观。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性,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并对人民负责。把为全人类谋福利,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使命。

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建构基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集中领导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sup>①</sup>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新中国70多年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集中领导的新型举国体制在攻克某一世界尖端技术领域、助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面对重大灾害等不确定性冲击中都显示出非凡的政治优势与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集中领导的新型举国体制是创新性的制度安排,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以这一特殊制度性组织方式作为建构基础,来理解中国发展的过去以及应对未来的挑战。

(2)新经济条件下经济复杂化与经济理论的重构。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又兼具经济转轨的“双重性质”,70多年成功的经济建设实践有效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不断的理论创新。在此过程中,中国创造性提出并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突破了西方经济学传统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知,极大丰富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同时,

<sup>①</sup> 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73页。

对西方经济学的宏观管理理论、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机制设计与激励相容理论、工业化与产权理论等经典理论实现了中国化的重构,这些理论创新成果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新经济发展大背景下,中国是新经济世界规模超大的第一现场,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的前沿阵地,是与其他超级大国经济分工格局重构与博弈的前线,这些典型事实更决定了中国有能力作为近距离观察者、深度参与者和引领者来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新经济的发展特征表明,新经济会涌现出各种复杂的行为以及正负反馈,并形成非均衡的复杂系统。上述中国新经济的独特特征,进一步印证了阿瑟曾认为“中国可以说是复杂经济学的活样本”的论断。<sup>①</sup>中国新经济的形态属于特定的、正在涌现的复杂经济社会系统。该系统是一个多因素的聚合体:集聚的经济行为主体、技术、组织和制度。在这一系统中,诸多因素在内部发生联系与相变,使得系统发展模式 and 机制运行直接制约着各因素间协同演化的方式和路径。

一方面,中国新经济系统具有多聚合性、多层次性,该体系存在着内嵌于各类多层级的子系统以及交叉分层的组织,所以,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的多层次性,使系统有明显的网络化特征,于是基于发展新经济的中国经济学体系需制定适应网络化生存的多重内容。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是不断试错与探索的正确路径,与复杂经济学强调的自组织和适应性相吻合,这一策略未来仍具适应性。另一方面,制度作为复杂经济社会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其涌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减少不确定性,它可以为系统创生提供助力和引导,可以为经济行为主体提供可识别的、采取有效行动的机会和规则。基于发展新经济的中国经济学体系,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集中领导的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集中领导的前瞻性、全局性及一贯性为中国经济发展定方向、掌好舵,为各类微观主体在这一复杂性系统中的学习、适应指明了方向。

基于发展新经济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其描述的系统内层以多种微观行为主体为核心,新经济下无所不在的万物互联成为各类微观行为主体行为裂变与演化的催化剂。在此情形下,网络组织的优越性得到凸显,因为网络是从事学习、适应与获得正反馈的主要载体,在此过程中形成独特的产业形态和组织架构。内层的系统之间形成了由“点”到“线”、再到“面”的“点线面”之间互相交织的互动形态。外层为作为复杂系统良性运行的制度环境,核心为中国共产党集中领导的一致性制度框架。内层要素及子系统会受到外层所处的制度环境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同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各种因素形成适应、协同和依赖。

总之,中国新经济发展开启了中国经济学的崭新创新空间,推动着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与时俱进:基于发展新经济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硬核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保护带的两条线索随着时代的变革、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地调整与完善。两条保护带的拓展重塑着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构筑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新视域——地球视域、新空间——信息网络空间、新架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复杂经济学等相融合的理论架构。其地球视域与信息网络空间角度,强调地球是承载人类生存的唯一家园,同时表明信息网络空间的包裹性使得全球人类命运更加共生共荣。可以说,以地球视域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更为根本的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复杂经济学等各类经济学的合理有用成分融会成新的架构,使得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打上鲜明的中国烙印,能够从逻辑上讲清“中国故事”,从实践上指明“中国道路”,从理论上形成“中国体系”(见图3)。

<sup>①</sup> 参见《专访布莱恩·阿瑟:中国相比西方更容易理解复杂经济学》,《新京报》,2019年10月19日,第B12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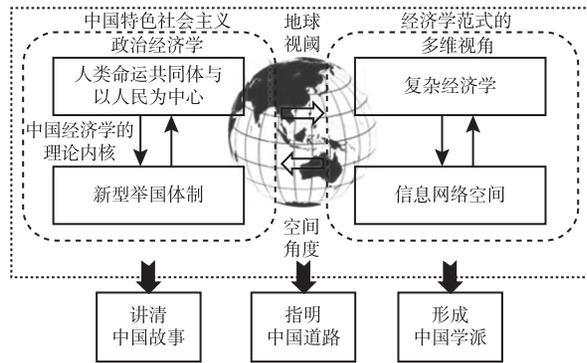


图3 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新视域、新空间和新架构

### 2. 基于复杂经济学视域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启发性思路”

厘清新时代下发展新经济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以及“硬核—保护带”逻辑思路后,本文具体建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启发性思路”。在此利用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的启发性思维中的正面启发法,即主动发现新的规律、解释新的现象来形成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启发性思路”六个维度(见图2)。中国经济学“启发性思路”六个维度形成“宏观‘增长’—中观‘产业’—微观‘企业’”的三层逻辑与“理论革新—实践指导”的双重体系。

(1)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合一性正在改写消费函数与生产函数,“以人为中心”成为经济发展新理念。在新经济下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呈现合一性,生产与消费难以分离,形成了“产销者”(Prosumer)。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合一性使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成为现实。一方面,互联网形成数字化的消费者行为,消费者通过信息化工具更多参与产品生产的售后意见和服务反馈、体验反馈,同时这是人人皆可参与其中的过程,分工不再是绝对的,消费者身份角色转变为多重;另一方面,生产者则会采取智能化的生产方式,从大规模与制式统一的生产转向生产高度个性化、定制化的产品,即让消费者更多地参与产品设计和开发环节,从而实现消费者的“生产参与”,产消融合成为基本趋势。此外,更为突出的是,任何信息皆可商品化:社交网络中的言论、图片、即席创作(内容产品)等皆为他人可付费的消费内容。为此,微观主体之间在新经济条件下形成网络化形态,“数据+连接”成为根本支配(杨虎涛和胡乐明,2023),这会从根本上改写消费函数与生产函数。新的消费函数已被改造(Giorgi et al., 2020);新的生产函数中,产出不仅仅取决于单纯要素投入,而是更多由微观主体所处信息网络空间中的连接度与智能度所决定。微观主体在复杂网络中的节点位置及资源、知识、创意的整合力决定着最大的产出水平。同时生产地点的离散化成为趋势,企业选址无须遵循传统,而是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和网络平台聚合前端消费者需求并反馈到生产环节,企业离散化生产变为现实,互联网使得经济地理空间得以重塑(安同良和杨晨,2020)。由此可见,新经济下产销者合一性决定了以人为本的创新正逐步显现。新经济突出的特征是“以人为中心”更加公平的新经济形态。为此,基于发展新经济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理论中心支点,即形成以人、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新理念。以人民为中心不仅要考虑当代人民的需要,更需兼顾代际间的公平。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鲜明的价值观导向。毋庸讳言,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价值观导向是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人民的幸福增进以及引领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筑与繁荣。

(2)新业态涌现与微观主体分布式节点成长,使得经济增长体系重塑成为经济发展新趋势。新经济下的产业新业态以新一代信息通用目的技术为共同的发展基础,以产业关联为牵引,导

致资源配置、市场空间、产业组织、产业界限以及产权基础等发生颠覆性变革。西蒙曾指出:随着信息的发展,有价值的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注意力经济应运而生。在注意力经济中,人人都可以成为注意力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所以市场参与者的微观主体会呈现分布式节点成长,从而形成注意力经济增长的“量子特征”。同时注意力经济由于广泛参与、速度制胜,以及不受限于生产场地和生产环境的特点,会导致以注意力为核心产品的无限供给,通过科技创新与规模经济形成自身报酬递增的特征。<sup>①</sup>由此可见,新经济具有收益递增的非线性正反馈发展效应,与传统依靠物质要素投入具有报酬递减特征的经济具有本质区别,其增长机制、增长逻辑和增长体系均在重塑。

新技术、新主体、新业态、新产品不断涌现的新经济时代最根本的变革在于,价值链在各个环节以及衍生附加值效应都呈现出全方位的重构:价值链不同部分以信息与数据为基础被无限细分,网络化生产方式成为基本趋势。万物互联数字化的经济形态中,供给的传统优势地位让位给需求,价值链被逆转(迪克,2020)。进一步在生产端,产业边界的模糊化、产业组织的网络化和产业集群的虚拟化成为趋势。同时,产业网络化成为企业构建核心竞争力的基本方式和手段。此外,产业集群虚拟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传统地理集群的空间局限正逐渐被突破并生成网络意义上的集群。供需两端的高度互联、供给体系的深度革新,改变了资源匹配和交易成本,从而形成新的生产率提升效应、结构优化效应与生态环境改善效应。另外,新经济条件下新型产业组织形态——平台经济兴起。作为不拥有生产手段但创造连接的平台企业,其在促进商品和劳务的流通、便利信息传递和社会交往、降本增效提升交易效率和主导且赋能数字时代企业创新等方面发挥了底层设施的角色。同时,平台形成的组织间动态不完全竞争格局和导致不稳定的就业和工资,正在带来经济总体的革命性重组。由此可知,平台的两面性既是经济体系重塑的核心力量,也是挑战新经济时代治理的“先锋军”。

(3)制造业企业竞争策略的根本性转变,要求以知识创造和知识分工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新模式。新经济全方位渗透融汇到经济各领域、各行业,同时创生了新的制造业集群。制造业的“数字化”依赖于一个复杂“技术簇群”的支撑,所以企业需要技术集成以及技术的协同进步参与竞争并实现产业化。与此同时,当今新产业已进入模块化设计、模块化生产的大发展时期,模块化已成为新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的本质。所以,在新经济下,发达国家技术领先公司利用集成技术的广泛运用、产品架构设计、通用模块外包、核心技术控制等方法将其他公司创新行为限定在非核心模块外围创新领域,并运用专利制度,构建一个“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不平等竞争优势区域,通过“专利圈地”形成专利壁垒来强化垄断、减少竞争。面对这些模块化陷阱和专利阻碍,发展中国家企业必须实现竞争策略的调整,借助知识创造、基础技术线路的突破,发展集成技术、模块化创新突破“低端锁定”并实现价值链攀升,夯实制造业的地基。华为手机 Mate 60 Pro 的成功推出就呈现出中国芯片制造突破发达国家技术封锁的全产业链赶超态势。从企业竞争策略转变出发,基于发展新经济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核心在于强调创新是新经济的主旋律与灵魂。企业创新的本质是新知识的创造与运用,而新知识创造是隐性知识转变为显性知识,并与其他显性知识相结合的过程,具体表现为知识转换的共同化—表出化—联结化—内生化的“SECI模式”(野中郁次郎和胜见明,2006)。同时知识作为一种商品参与到市场交易中,并涌现出一批基于知识进行交易的企业或个体,进而发展出一套基于知识创造、传播、应用的产业体系。为此,以复杂经济学视域构建中

<sup>①</sup> 在中国注意力经济最突出的表现为“网络直播”,网络直播成为“线上引流+实体消费”的数字经济新模式。

国特色理论,需要以知识创造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即以知识创造进一步形成知识分工作为“序参数”<sup>①</sup>,来观察与理解复杂经济秩序的演化。

(4)物理空间与信息网络空间耦合化带来生存空间扩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特征。新经济通过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两个维度相互联系、彼此促进来推动“信息革命”的发生,从而引致不可触摸的信息型经济取代可以触摸的物质型经济。同时也使得人的生存空间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开始将人类生产经营活动的发展空间、市场空间从物理空间延伸到虚拟空间——信息网络空间。伴随着AI、元宇宙、生命科学等诸多技术创新成果的涌现,这种空间延伸进一步体现为物理空间、网络空间及生物空间的深度耦合化。多重空间耦合打破了生产经营、生活体验等时空界限,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全新的生存发展疆域与市场发展空间,同时带来两个层面的深刻变化:一是国家竞争优势不仅来自物理空间,更多来源于信息网络空间。新经济革命重塑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全球产业分工从产业链式分工逐步转向网络式分工,在此过程中国家之间竞争开始向信息网络空间过渡和延伸。所以,数字经济和信息网络空间的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新动力,在建设网络强国并挖掘一国的信息网络经济潜力方面起着基础性作用。如何建立在主权平等原则基础上的网络新秩序,形成多边、透明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成为新型国际关系需要解决的重要议题。二是由于人的生存空间从有形的物理空间开始延展到信息网络空间,人的生活方式、行为逻辑、交往形式、生存意义均会发生深刻的变革,最终必然会带来人们思维方式的巨变。网络时代思维呈现非欧几里得空间的网络状结构新思维模式(巴拉巴西,2013),而这一系列思维方式的革新,恰与复杂性时代的到来相契合,网络思考方式具有可以解释经济系统的内生危机和整体演化的特点(Kirman,2011)。

(5)实施差异化产业政策形成以新型举国体制铸就创新生态系统,成为经济发展的新支撑。21世纪以来,一些发达国家采取了逆全球化战略,大国博弈、技术封锁、专利阻碍已成为常态。中国当下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复杂经济学核心信条表明,战略可以把不确定的社会设计成更好的进化体和适应体(拜恩霍克,2019)。基于此,新经济条件下中国的科学政策、技术政策与创新政策的重点是以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为基础、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为引领、以自主创新为根本,构筑新型国家创新生态系统。新型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特色在于以大国博弈战略视野引领创新,整合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和开放共赢的全球资源优势,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加快面向前沿性、原创性基础科学问题和事关国家安全核心技术突破的多维协作创新体制建设,探索通过有组织、有战略布局的创新来加速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供给的强国路径,从而逐步破解“卡脖子技术”的困境(安同良等,2023a)。新型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关键在于发挥“特惠式”产业政策的有效性。针对中国不同的领跑、并跑和跟跑的企业或行业状态,在产业政策上分类指导,实施差异化的产业政策,提高产业政策靶向性(安同良等,2020)。未来中国建设科技创新强国,需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结合起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抓住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新战略机遇期,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多主体协同共创共赢的创新新局面,从而在新时代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sup>①</sup> 德国物理学家哈肯(Hermann Haken)于1976年出版的《协同学引论》中指出:一个系统的稳定性受到“快变量”和“慢变量”两类变量的影响。当系统从稳定的无序的旧结构冲破稳定向有序的新结构演化时,慢变量起着决定性作用,它的大小代表了系统的有序程度,故称其为序参数。

(6)政府监管的网络互联式转变以及防患未然的政策选择取向,成为经济发展的新保障。新经济分子化、虚拟化和网络去中心化的特征不仅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运行方式发生新的转变,也会对已有的政府政策选择与治理手段带来全新的挑战。一方面,新经济带来了海量信息的流通和汇聚,在其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监管,人人都可能被互联网“绑架”,成为信息过度自由的牺牲品。从严管网、从严治网,加强对网络过度行为的监管和治理,维护互联网运行的安全和秩序,是新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亟须面对的课题。在此过程中,针对新经济网络化和经济社会复杂化的特征,探索“一刀切”式僵硬管理和“切一刀”的随机管理向审慎包容、量身定制监管模式的转变。另一方面,要在新经济背景下推行与之相契合的智慧监管,即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以监管信息为关键,实现政府监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高度融合。新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社会的复杂性提升,经济系统对各类反应完全呈现开放状态,在此过程中,预期的不确定、结构突变、灾变冲击、多方博弈加剧等,使得经济系统根本不会像传统经济学阐述那样慢慢向均衡收敛,所以纠正偏离、促进收敛的政策失败与无效的概率明显提升,政策预期实现的结果会大打折扣。鉴于此,新经济条件下,在政府政策制定、设计以及执行中应遵循复杂经济学的方法论,即在政策实施前引入有效的失败模式研究(唐任伍等,2020),即形成留有余地、防患未然的政策思路,从而提高新经济时代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与精准性。

## 五、结论及启示

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革命,正深刻改变着人类的一切社会经济活动与生存空间,更推动着中国经济踏上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新经济革命既为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国家竞争力提升、构筑经济安全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更为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战略新机遇。为此,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学内嵌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与理论变迁的动态演化过程,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硬核,以信息网络空间与复杂经济视域等视角为底层逻辑,具有“硬核—保护带—启发性思路”完整架构,以人民为中心的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构筑与繁荣为本质的经济学范式。本文为“中国经济学走向何处”及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探索了可能的路径。

第一,中国经济学是一个内嵌动态演化过程的经济学范式。中国已走过了70多年辉煌的经济发展历程,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亦步入快速成长期,这为构建新时代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实践与理论的双重基础。有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范式的硬核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保护带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及其新发展、新经济条件下经济复杂化引致的经济理论重构。中国经济学在多阶段不断演化的过程中,提炼与总结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诸多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在中国发展道路自信的基础上正逐步实现理论自信。在通过修正与整合复杂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等各类经济学合理有用成分基础上,中国经济学理论范式被打上鲜明的中国烙印,能够从逻辑上讲清“中国故事”,在实践中指明“中国道路”,从理论上形成“中国体系”。

第二,中国经济学以信息网络空间与复杂经济视域等视角为独特架构。中国经济学是面向新经济的经济学范式,具体表现为消费者与生产者网络经济的合一性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微观行为主体在信息网络空间形成网络型节点存在,并涌现出新型的产业形态与组织架构,经济增长体系正在被重塑。在新经济条件下,企业竞争策略要求以知识创造、注意力成本下降为核

心,同时深谙微观主体分布式节点成长、价值链颠覆式变革的新常态。微观主体、产业形态和组织架构之间形成了“点线面”之间互相交织的空间模式,物理空间与信息网络空间耦合化带来的生存空间扩展成为新特征。经济系统的复杂性要求复杂适应性的制度环境,以新型举国体制铸就的制度生态系统,并辅之以政府监管的网络式转变以及防患未然的政策取向,成为中国面向新经济的新引擎、新支撑和新保障。

第三,中国经济学的本质是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理论范式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结合,该范式打造以人民为中心的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模式”,通过共同的理念、共同的行动、共同的秩序来一起面对技术革命不断进步、生产与生活方式不断创新、气候与生物灾变不断冲击等挑战,构筑基于新知识、新技术、新空间为基础的全人类新经济共同体。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抓手,抗击逆全球化暗流;以增进全世界的民生福祉为价值导向,秉承知识文明全球化精神,形成新技术保护、扩散和应用的合作机制,努力实现人类在面对新经济的“公地的喜剧”,并形成引领世界未来发展的中国方案、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

#### 〔参考文献〕

- [1]安同良,姜舸,王大中.中国高技术制造业技术测度与赶超路径——以锂电池行业为例[J].经济研究,2023a,(1):192-208.
- [2]安同良,魏婕,姜舸.基于复杂网络的中国企业互联式创新[J].中国社会科学,2023b,(10):24-43.
- [3]安同良,魏婕,舒欣.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测度——基于微观创新调查的跨期比较[J].中国社会科学,2020,(3):99-122.
- [4]安同良,杨晨.互联网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微观机制与宏观效应[J].经济研究,2020,(2):4-19.
- [5]安同良.中国经济学不仅要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还要指导未来发展[J].教学与研究,2020,(7):18-20.
- [6][美]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美]安德鲁·麦卡菲.第二次机器革命[M].蒋永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 [7][英]埃里克·拜恩霍克.财富的起源[M].俸绪娴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
- [8][美]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链接[M].沈华伟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 [9][美]布莱恩·阿瑟.复杂经济学:经济思想的新框架[M].贾拥民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
- [10][美]布莱恩·阿瑟.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M].曹东溟,王健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 [11]陈平.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动力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12]程霖,张申,陈旭东.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一个历史考察[J].经济研究,2020,(12):49-51.
- [13][奥]冯·米塞斯.人的行为[M].夏道平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
- [14][德]弗里德里希·克拉默.混沌与秩序:生物系统的复杂结构[M].柯志阳,吴彤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
- [15][荷]简·梵·迪克.网络社会[M].蔡静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
- [16][美]杰里米·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个物联网、合作共赢的新经济时代[M].赛迪研究院专家组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17]贾根良.复杂性科学革命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J].学术月刊,2006,(2):77-82.
- [18]洪银兴.中国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和理论创新[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3,(2):75-87.
- [19][美]赫伯特·A.西蒙.人工科学[M].武夷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 [20]刘洪.经济混沌管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 [21][美]罗伯特·D.阿特金森,[美]拉诺夫·H.科尔特.美国新经济[M].焦瑞进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22][美]梅妮拉·米歇尔.复杂[M].唐璐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 [23]苗东升.经济研究与复杂性科学[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30-36.
- [24][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 [25]唐任伍,刘洋,李楚翘.布莱恩·阿瑟对复杂经济学的贡献[J].经济学动态,2020,(3):147-160.
- [26]汪应洛,黄长征.有限理性与复杂经济系统研究方法论[J].中国软科学,1997,(2):20-23.
- [27]文建东.经济学研究的复杂性科学思路[J].经济学动态,2005,(6):68-74.
- [28]邹焜.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面生产”理论的复杂性特征[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6):86-92.
- [29]许宪春,张钟文,关会娟.中国新经济:作用、特征与挑战[J].财贸经济,2020,(1):5-20.
- [30]杨涛涛,胡乐明.不确定性、信息生产与数字经济发展[J].中国工业经济,2023,(4):24-41.
- [31][美]约翰·霍根.科学的终结——在科学时代的暮色中审视知识的限度[M].孙雍君等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7.
- [32][日]野中郁次郎,[日]胜见明.创新的本质[M].林忠鹏,谢群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 [33][英]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 [34]张翼成,吕琳媛,周涛.重塑:信息经济的结构[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
- [35]Arthur, W. B.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J]. *Economic Journal*, 1989, 99(394): 116-131.
- [36]Arthur, W. B. Process and Emergence in the Economy[A]. Arthur, W. B. et al. (eds). *The Economy as an Evolving Complex System II* [C].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 [37]Arthur, W. B. Complexity and the Economy[J]. *Science*, 1999a, (284): 107-109.
- [38]Arthur, W. B. The End of Certainty in Economics[A]. Aert, D. et al. (eds). *Einstein Meets Magritte* [C].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9b.
- [39]Arthur, W. B. Foundations of Complexity Economics[J]. *Nature Reviews Physics*, 2021, 3(2): 136-145.
- [40]Elsner, W., T. Heinrich, and H. Schwardt. *The Microeconomics of Complex Economies: Evolutionary, Institutional, and Complexity Perspectives* [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2015.
- [41]Giorgi, G. D., A. Frederiksen, and L. Pistaferri. Consumption Network Effects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20, 87(1): 130-163.
- [42]Helbing, D., and S. Ballelli. Fundamental and Real-world Challenges in Economics [J]. *Science and Culture*, 2010, (76): 9-10.
- [43]Kirman, A. *Complex Economics: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 [44]Rosser, J. B. Jr. *Fou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 of Complexity Economics* [M]. Cham: Springer, 2021.
- [45]Shapiro, C., and H. R. Varian. *Information Rules: A Strategic Guide to the Network Economy* [M].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1999.
- [46]Shepard, S. B. The New Economy: What It Really Means [J]. *Business Week*, 1997, (11): 38-40.
- [47]Simon, H. A. The Architecture of Complexity [J].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62, 106(96): 467-482.
- [48]Tapscott, D. *The Digital Economy: 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 [M]. New York: McGraw-Hill, 1995.

**Where Is Chinese Economics Leading to: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conomics based on New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exity Economics**

AN Tong-liang<sup>1</sup>, WEI Jie<sup>2</sup>

(1. Business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2. School of Digi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new economic revolution, with the digital and biotech revolution including the Internet of everything, big data, block-cha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genetic engineering as the core, has altered all economic and social activities of human beings. With China being the largest emerging economy, how to seize the great opportunities, such as technology leapfrogging and global value chain climbing caused in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has become the crucial decision for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blooming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new economies, and new business forms,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at the new economy is triggering the rise of a new economics paradigm led by complexity economics. China's new economy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leading global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calling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matched system of economic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researching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research paradig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build the system of economic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a complete framework of "hardcore-protective belt-heuristic thinking" with the reference of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rs by Lakatos, the philosopher of science, and f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conomy. ① The hardcore is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for developing the new economy in the new era to buil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economics. ② There are two routes of developing a new economy and building the "protective belt"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economics: one is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its new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nd the other is the economic complic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theory under the new economic conditions. ③ Based on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hardcore-protective belt", the "heuristic thinking"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economics presents six new dimensions.

In conclusion, we believe that Chinese economics is embedded in the dynamic evolution proces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changes. It is an economic paradigm with underlying logic from perspectives such as cyberspace and complex economic, and fundamentally characterized by the construction and prosperity of a people-centered global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shor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ossible path of "where is Chinese economics leading to" and describes possible directions to build China's independent economic knowledge system.

**Keywords:** Chinese economics; new economy; complexity economics;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s independent economic knowledge system

**JEL Classification:** N01 O10 O33

〔责任编辑:王燕梅〕